

本书获湖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17109)、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1&ZD151)、湖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计划项目(B2018219)、武汉体育学院青年教师科研基金项目(2018Z03)资助



儿童青少年

乐观人格的发展及亲子代际传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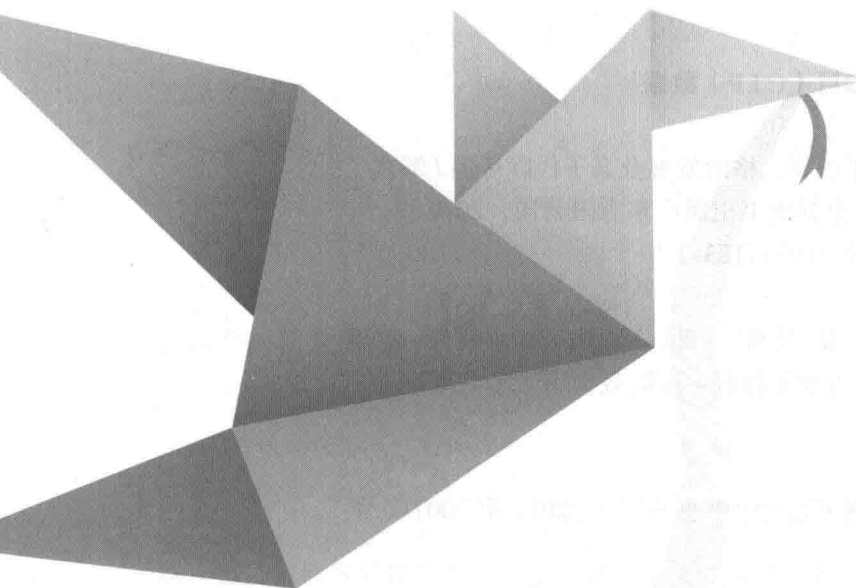
邹容 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湖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2018ZD003)
计划项目 (B2018219)

(11&ZD151)、湖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
基金项目 (2018Z03) 资助



儿童青少年 乐观人格的发展及亲子代际传递

邹容 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广州·上海·西安·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儿童青少年乐观人格的发展及亲子代际传递 / 邹容
著. — 广州: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2019.12
ISBN 978-7-5192-7183-1

I. ①儿… II. ①邹… III. ①人格—儿童教育—家庭教育
②人格—青少年教育—家庭教育 IV. ①G782
②B8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300742 号

-
- | | |
|------|--|
| 书 名 | 儿童青少年乐观人格的发展及亲子代际传递
ERTONG QINGSHAONIAN LEGUAN RENGE DE FAZHAN JI QINZI DAIJI CHUANDI |
| 著 者 | 邹 容 |
| 责任编辑 | 冯彦庄 |
| 封面设计 | 汤 丽 |
| 责任技编 | 刘上锦 |
| 出版发行 |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
| 地 址 | 广州市海珠区新港西路大江冲 25 号 |
| 邮 编 | 510300 |
| 电 话 | (020) 84452177 |
| 网 址 | http://www.gdst.com.cn/ |
| 邮 箱 | wpc_gdst@163.com |
| 经 销 | 新华书店 |
| 印 刷 | 广州市迪桦彩印有限公司 |
|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
| 印 张 | 10.25 |
| 字 数 | 149 千字 |
| 版 次 | 2019 年 12 月第 1 版 201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
| 国际书号 | ISBN 978-7-5192-7183-1 |
| 定 价 | 56.00 元 |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错误, 请与出版社联系)

前言一

乐观人格，也称气质性乐观，是指个体对未来结果的一种总体、积极或消极的预期。气质性乐观虽属于认知性人格特质，但对个体的生理、心理健康和幸福感都有影响，尤其是在压力性情境和环境改变的状况下，气质性乐观更是个体积极适应结果的有力预测指标。儿童青少年时期是生理、社会性和心理发生急速变化的时期，这些变化必然会给儿童青少年带来压力。作为积极心理资本中的核心成员，对儿童青少年而言，气质性乐观一方面能够缓冲压力等带来的不利影响；另一方面也能促进儿童青少年发展出有效策略应对困难。虽然已有大量研究证明了气质性乐观对儿童青少年，乃至成人的各方面发展的增益，但少有研究探讨儿童青少年的气质性乐观的年龄差异，更少有研究从家庭背景角度探讨气质性乐观的亲子代际传递效应及背后可能的作用机制。无疑，弄清这些问题有助于更好地培养和发展儿童青少年的气质性乐观。

本书采用横断研究设计，抽取武汉市小学三年级至高中二年级的中小学生在中学生修订版的生活定向测验问卷、家庭富裕量表、父母气质性乐观问卷、父母教养方式量表及亲子关系量表。纳入最终数据分析的为2949名小学三年级至高中二年级的儿童青少年($M_{\text{年龄}} = 12.44$ 岁; $SD = 2.68$; 年龄范围8~19岁)。研究同时采用多种统计分析方法，考察了儿童青少年阶段气质性乐观的结构，并检验了气质性乐观测量工具对童年晚期至



青少年期的个体适用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了气质性乐观的结构发展和平均水平的发展。接着从家庭背景出发，考察了父母的气质性乐观对子女气质性乐观的影响，揭示出气质性乐观存在代际传递效应。最后，以教养方式和亲子关系为切入点，考察了气质性乐观的代际传递效应背后可能的作用机制。研究主要得到以下结果和结论：

1. 儿童青少年的气质性乐观的结构及气质性乐观工具的适用性

通过探索性因素分析、目标旋转、一致性评估这一用来评估测量工具属性的方法，来评估气质性乐观的因素水平在不同年级间的跨群体一致性，进一步对该量表在不同年级间的内部一致性 α 系数及效度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该量表用于测量小学四年级至高中二年级儿童青少年的气质性乐观时，支持乐观—悲观的二因子结构，且这种二因子结构在各年级间是相似的；量表在小学四年级至高中二年级的信效度指标均达到心理测量学要求。故儿童青少年的气质性乐观的结构包含相对独立的乐观因子、悲观因子，且该量表适用于测量我国小学四年级至高中二年级儿童青少年的气质性乐观水平。

2. 儿童青少年的气质性乐观的发展

主要考察了儿童青少年的气质性乐观的结构、平均水平的发展。结果表明，在气质性乐观结构的发展方面，童年晚期至青少年期个体的气质性乐观，由乐观、悲观这两个因子构成，且这一结构在小学四年级至高中二年级间是相似的，即气质性乐观的二因子结构在童年晚期至青少年期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在气质性乐观的发展轨迹方面，儿童青少年的乐观呈线性略下降，悲观平均水平呈曲线下降，总体乐观（代表乐观的存在和悲观的缺乏）水平呈线性上升趋势；而且，悲观平均水平的变化会受到个体的性别、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男生或来自处境不利家庭的个体，其悲观水平随年龄增长而下降得更缓慢。

3. 气质性乐观的代际传递效应

整体而言，气质性乐观存在亲子代际传递效应，而且父亲的气质性乐观对子女的气质性乐观的影响更大；气质性乐观的代际传递效应，不会随

子女的性别而不同，但会随子女年龄的增大而出现加强的趋势。

4. 气质性乐观的代际传递的作用机制

气质性乐观的代际传递，部分是通过权威型、独裁型教养方式的中介作用实现的，父母的纵容型教养在其中的中介作用不显著。此外，父母的气质性乐观通过教养方式的中介作用于子女气质性乐观的过程，受到亲子关系的调节。

具体而言，父亲的气质性乐观通过独裁型教养的中介作用于子女的气质性乐观的过程，受到父子关系的调节。对父子关系较好的儿童青少年来说，父亲的气质性乐观通过独裁型教养对子女气质性乐观的间接效应相对较强。

母亲的气质性乐观通过权威型教养的中介过程对子女气质性乐观的作用，受到母子关系的调节。对母子关系较好的儿童青少年来说，母亲气质性乐观通过权威型教养对子女气质性乐观的间接效应相对较强。

前言二

如果你能送给儿女一项能力，请认真考虑乐观主义。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丹尼尔·卡内曼

自 20 世纪 80 年代积极心理学兴起以来，作为与人类积极发展密切相关的一种人格特质，气质性乐观便成为研究者关注的焦点之一（Orejudo, Puyuelo, Fernández-Turrado & Ramos, 2012）。已有的大量研究结果表明，气质性乐观与各年龄段的良好适应结果均紧密相联。对儿童青少年来说，高水平的气质性乐观能预测更少的抑郁症状和行为问题（Ey et al., 2005; Lemola et al., 2010）、更强的社会能力（Lemola et al., 2010），以及更高的目标追求或职业期望（Patton, Bartrum & Creed, 2004）。正因为它对个体的幸福感、成就、人际关系等是如此重要，以至于 2002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之一丹尼尔·卡内曼曾说：“如果你能送给儿女一项能力，请认真考虑乐观主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市八一学校考察时的重要讲话中，也强调中小学生应“养成健康、乐观、向上的品格”。2016 年 9 月 13 日发布的《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也明确提出要培养学生“积极的心理品质，自信自爱，坚韧乐观”。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尽管有大量研究表明，气质性乐观在个体发展的多个领域均表现出积极效应，却少有研究去探讨气质性乐观的发展变化。因而目前人们对气质性乐观是如何随年龄而发展的情况了解得很少（Orejudo et al., 2012），尤其对童年晚期至青少年期气质性乐观的发展特点更是所知甚少。相比于其他年龄阶段，儿童青

少年期是生理、社会性和心理发生急速变化的时期（Soto, John, Gosling & Potter, 2011），处于这一年龄阶段的个体，面临着更密集的发展任务，并以全新的方式与他人互动。这些变化可能会极大地影响个体与环境间的交互作用，从而影响个体的人格发展（Baltes, Lindenberger & Staudinger, 2006）。儿童青少年期是人格发展与培养的关键时期（杨丽珠, 2014, 2015）。弄清儿童青少年气质性乐观的发展特点，有利于发展出有针对性的气质性乐观发展和培养方案，促进儿童青少年气质性乐观的积极发展。

“家庭是人格的锻造车间”，儿童青少年的气质性乐观在发展过程中，家庭是重要的影响因素，父母作为子女的第一任教师（Seward & Stanley Stevens, 2014），是塑造子女气质性乐观的重要力量。父母的能力、观念、行为；甚至社会经济地位等传递给子代的现象，称为“代际传递”（池丽萍, 2012, 2013a, 2013b; Martin et al., 2010）。父母与子女的气质性乐观是否存在代际传递效应呢？目前，为数不多的从家庭背景角度来探讨儿童青少年气质性乐观的影响因素研究，往往只关注父母一方的气质性乐观的影响（Orejudo et al., 2012; Yu & Ko, 2013）。即使少量研究同时探讨父母双方气质性乐观对子女气质性乐观的影响，所得结果也与上述单独探讨父母一方的气质性乐观对子女气质性乐观影响的研究结果不一致。因此，关于气质性乐观是否存在亲子代际传递效应，现有的研究结果尚未达成一致的观点。

从基因学的角度讲，气质性乐观是存在对应的基因系统的（Bates, 2015），遗传因子可以解释 25% ~ 36% 的气质性乐观变异（Mosing, Zietsch, Shekar, Wright & Martin, 2009; Plomin et al., 1992）。此外，由于人们在选择伴侣时会更倾向于选择与自己特质相似的个体（即选择性配对，assortative mating），这增大了个体的某些特质传递给下一代的可能性（Theissen & Greg, 1980）。从行为学角度来讲，乐观的父母会在养育子女的过程中，有意或无意地表现出乐观积极的态度，采用温暖、有控的教养方式，从而使得其子女拥有更高的乐观水平（Hasan & Power, 2002; Heinonen, Räikkönen & Keltikangas-Järvinen, 2005）。因此，从基因遗传



学和行为学的角度讲,气质性乐观应该存在亲子代际传递效应。然而,新的问题随之产生:父母的气质性乐观又是如何“传递”给子女的呢?这种“传递”过程是否在某些条件下会加强呢?

根据人类发展的交互模型 (Conger & Donellan, 2007), 父母的气质性乐观对子女的气质性乐观的影响, 是在双方的不断互动中完成的。父母在与子女互动的过程中所展现出的教养观念、教养行为及情绪表现, 共同组成父母的教养方式 (张兴慧, 董爱波, 王耘, 2015)。一方面, 父母的教养方式会影响儿童青少年的人格与社会性的发展 (徐慧, 张建新, 张梅玲, 2008; 杨青, 2004; Baumrind, 1978; Heinonen et al., 2005; Joo & Park, 2013; Kitamura et al., 2009); 另一方面, 父母自身的气质性乐观也会影响其教养方式 (Belsky, 1984; Heinonen et al., 2006; Jones, Forehand, Brody & Armistead, 2002; Tayler et al., 2012)。已有的有关负性情绪、反社会行为、主观幸福感等的代际传递研究中, 教养方式均为重要的中介变量 (张兴慧等, 2015; Hammen, Shih & Brennan, 2004; Thornberry, Freeman-Gallant, Lizotte, Krohn & Smith, 2003)。因此, 父母的气质性乐观可能会通过教养方式来影响子女的气质性乐观水平。

但教养方式的间接作用可能会受到其他因素的调节, 如亲子关系。亲子关系的好坏, 既能直接影响又能通过与教养方式的交互作用来间接对儿童青少年的行为等产生影响 (吴念阳, 张东昀, 2004; Bronte-Tinkew, Moore & Carrano, 2006)。根据人类发展的“保护因子—保护因子模型” (protective-protective model), 多个保护因子在预测结果变量时, 可能会发生交互作用 (王艳辉, 张卫, 彭家欣, 莫滨瑞, 熊丝, 2009)。教养方式对子女气质性乐观的预测作用, 是否会受亲子关系的调节呢?

从代际传递角度来探讨父母气质性乐观对子女气质性乐观影响的研究屈指可数, 而且有关气质性乐观的代际传递的这些研究, 也多以气质性乐观存在代际传递效应的事实为目的, 缺乏对该效应背后的作用机制和过程的描述。弄清气质性乐观亲子代际传递效应背后的作用机制, 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气质性乐观亲子代际传递背后的潜在模式, 以及中间可能存在的间

接影响因素，从而可以更有效地为儿童青少年气质性乐观的培养提出干预计划和措施。

综上，本书将围绕儿童青少年的气质性乐观的发展特点、气质性乐观的代际传递效应和该效应背后可能的作用机制这三个主要问题展开研究。

目 录

第一部分 文献综述·····	1
一、气质性乐观的相关研究 ·····	1
二、代际传递：父母乐观与子女乐观的关系 ·····	19
三、教养方式、亲子关系与气质性乐观的代际传递 ·····	22
第二部分 问题的提出与总体研究设计·····	30
一、已有研究的不足 ·····	30
二、本书探讨的问题 ·····	32
三、整体研究设计 ·····	32
第三部分 实证研究·····	34
一、儿童青少年气质性乐观结构的发展及测量工具的适用性 ·····	34
二、儿童青少年气质性乐观的发展特点 ·····	44
三、代际传递：父母乐观与子女乐观的关系 ·····	59
四、气质性乐观的代际传递机制：教养方式和亲子关系的作用 ···	74



第四部分 综合讨论	95
一、气质性乐观测量工具对儿童青少年的适用性	96
二、儿童青少年气质性乐观的结构及发展	96
三、儿童青少年气质性乐观的发展轨迹	97
四、代际传递：父母乐观与子女乐观的关系	99
五、气质性乐观的代际传递的作用机制： 教养方式和亲子关系的作用	100
六、本书的特色与创新	102
七、对儿童青少年气质性乐观的发展和培养的启示	104
八、本书的不足及未来的研究方向	107
第五部分 研究结论	109
一、气质性乐观测量工具对儿童青少年的适用性	109
二、儿童青少年的气质性乐观的发展	110
三、气质性乐观的代际传递效应及作用机制	110
参考文献	112
附 录	141
附录一 生活定向测验中文修订版	141
附录二 家庭富裕量表	143
附录三 生活满意度量表	144
附录四 教养方式量表（部分）	145
附录五 亲子关系量表	146
附录六 给测试学校的邀请函	147
后 记	148

第一部分 文献综述

一、气质性乐观的相关研究

1 乐观概念的两种取向

乐观是一个古老而有生命力的话题。在民间智慧里，有关乐观与悲观的名人名言、谚语等随处可见，如诗人 Gibran（1951）曾说道，同样是一枝玫瑰花，乐观者看到的是美丽的花而非扎手的刺，悲观者只看到了锐利的刺而对玫瑰花视而不见。又如，Winston Churchill 也提到，悲观者从机遇中看到的是困难，而乐观者从困难中发现机遇。

乐观从民俗心理学领域进入科学研究的范畴，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生活定向测验（life orientation test, LOT）的产生，并在 80 年代末、90 年代初经 Seligman 等人提倡的积极心理学运动而得以快速发展。心理学在产生之初便确定了三个伟大的目标：治疗和预防人的心理疾病、充分发挥有天赋者的潜能、使人类的生活更幸福（Seligman, 1998）。但 Seligman 和 Csikszentmihalyi（2000）认为，在积极心理学以前，心理学家都过于关注人的病态和消极面，而这无法帮助人们发挥他们全部的潜力、获得幸福。因而，积极心理学强调关注与幸福感有关的心理特征，包括个体主观体验



方面的幸福感、满足感、沉浸感（flow）等，还包括个体水平的积极特质，如乐观、爱的能力、勇气、艺术敏感性、坚持性、宽恕等，以及群体水平的公民美德，如责任心、利他、容忍、职业道德等。随着乐观测量工具的出现（Scheier & Carver, 1985），以及积极心理学的正式成立（Seligman, 1999），二三十年来，乐观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得到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在对乐观展开的诸多研究中，关于乐观的概念，存在两种取向：气质性乐观（Dispositional Optimism, DO）和乐观—悲观解释风格。

1.1 气质性乐观概念的提出

气质性乐观的概念由 Scheier、Weintraub 和 Carver（1986）基于动机的期望—价值模型（expectancy-value models of motivation）提出。该模型认为，个体的行为是指向所追求的目标的，目标对个体越重要，该目标的价值越大；个体会通过调整自身的行为来达成想要的目标。该理论中的期望，是指个体对自身能否达成目标的信心或怀疑。如果个体对达成目标持有充分的信心，个体就会开始和持续行动；相反，如果个体缺乏信心，个体就不太可能采取追求目标的行动。即使行动，此过程也会因信心缺乏而中途放弃。基于该理论，Scheier 等（1986）提出气质性乐观的概念，将其定义为是一种对未来美好结果的总体期望，是相信未来美好结果会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种信心。乐观的人相信好事会发生在他们身上，悲观的人则预期坏事会发生在他们身上。这种认知上的个体差异，直接影响到个体以怎样的方式对待问题，并在解决问题的策略和结果上出现差异（Carver, Scheier & Segerstrom, 2010）。

气质性乐观是个体对未来好结果的总体期望。不同于某些具体情境下的乐观，它是一种跨情境、具有一定时间稳定性的人格特质（Carver & Scheier, 2014）。尽管这一特质更多地代表了人格层面中的认知成分，但从其概念提出的来源可知，它与人的情绪、动机、行为等密切相关。在人

格特质“家族”中,“大五”是得到广泛实证研究支持的具有跨语言、跨文化、跨情景、跨评定者的一致性和稳定性的人格结构,代表了个体人格特质的重要方面(John, Naumann & Soto, 2008)。但这一人格结构无法很好地涵盖气质性乐观的内涵(Carver & Scheier, 2014)。有研究者认为,气质性乐观是神经质和外向性的组合(Marshall, Wortman, Kusulas, Hervig & Vickers, 1992)。然而,进一步的研究结果发现,气质性乐观与神经质、外向性存在差异(Alarcon, Bowling & Khazon, 2013; Kam & Meyer, 2012),而且与宜人性和尽责性有重合之处(Sharpe, Martin & Roth, 2011)。从理论的角度讲,“大五”人格特质可能代表了人类动机的内容组成,如神经质与威胁回避相关、外向性与社会影响力有关等;而气质性乐观,则可能代表了人类动机是如何发挥作用的。比如从动机的期望—价值理论来说,气质性乐观可以部分解释个体是如何将目标转化为具体的行动的。从实证研究的角度讲,与其他人格特质相比,气质性乐观对身体健康、压力应对、主观幸福感等有更为独特的预测作用(Carver & Scheier, 2004; Heinonen et al., 2006; R  ikk  nen & Matthews, 2008; Tindle et al., 2009)。因此,气质性乐观的内涵及独特的预测作用,是无法被其他人格特质或人格维度所取代的。

1.2 乐观—悲观解释风格的提出

受“习得性无助”实验的启发, Seligman 等人(1984; 1991)基于归因理论,提出了看待和测量乐观的另一种取向:乐观—悲观解释风格。这一取向基于的理论假设是人们对未来的期望如何,可以通过人们对过去事件的归因来间接测量(Peterson & Seligman, 1984a, 1984b; Seligman, 1991)。如果将过去的失败归因于稳定的因素,那么个体更可能对该领域的未来有坏的预期。因为个体归因的稳定因素是相对永久存在的,所以这一因素对未来就会产生相同的不利影响。如果将过去的失败归因于不稳定



因素,由于这一因素会发生变化,具有不稳定性,因此,这种归因下的个体更可能对该领域的未来有较好的预期。同样,个体对失败归因的普遍性、个性化,都会影响到个体对未来的预期。将好事情归因于稳定的、普遍的、内部的原因,将坏事情归因于不稳定的、具体的、外部的原因,属于乐观解释风格;将好事情归因于不稳定的、具体的、外部的原因,将坏事情归因于稳定的、普遍的、内部的原因,属于悲观解释风格。

测量乐观—悲观解释风格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由 Peterson 等(1982)编制的归因风格问卷(Attributional Style Questionnaire, ASQ),该问卷让个体想象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一系列假设的负性事件,并让个体对列出的负性事件进行归因,通过对归因维度的分析,确定个体的乐观程度。另一种测量归因风格的方法称为言语解释的内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 of Verbal Explanations, CAVE)(Peterson, Luborsky & Seligman, 1983; Peterson, Schulman, Castellon & Seligman, 1992)。CAVE 通过对个体有关负性结果的口头或书面解释内容(如信件、日记、采访、演讲等)进行分析,从而来判断其归因风格。这一技术相当灵活,适用于档案研究。

两种取向下的乐观概念,都认为乐观者对未来持有好的期望,悲观者对未来持有不好的期望,这种对未来的期望会对个体的情绪、动机与意志行为等产生影响。不同之处在于,气质性乐观是一种稳定的人格特质,是由个体直接报告出的一种对未来好结果的积极预期,时间着眼点是未来;乐观—悲观解释风格则关注对过去或现在事件的解释,通过归因分析来间接判断个体对未来的预期是好是坏。乐观—悲观解释风格更倾向于是气质性乐观的一种表现形式(温娟娟,郑雪,张灵,2007)。

不同研究者对二者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有研究表明(Peterson & Vaidya, 2001),二者间相关显著,二者对抑郁症状具有相似的预测作用。也有研究表明(Hirsch & Conner, 2006),气质性乐观与乐观—悲观解释风格两者间关系不大,二者对不同的结果变量有着各自独特的作用。本书

关注的是作为人格特质的气质性乐观。

2 气质性乐观的测量

基于行为的期望—价值模型和气质性乐观的概念，研究者们编制了各种测量个体气质性乐观差异的量表。尽管这些量表强调的侧重点各异，但都是基于气质性乐观的概念。以下列出的几种主要测量工具中，Scheier 和 Carver 于 1985 年编制的生活定向测验 LOT (Life Orientation Test, LOT) 及 1994 年的修订版 LOT-R (Life Orientation Test-Revised, LOT-R) (Scheier, Carver & Bridges, 1994)，是目前测量气质性乐观最广泛采用的工具。

2.1 期望价值评定量表

Wengler 和 Svenson (1982) 基于期望—价值模型，将乐观—悲观定义为个体对个人生活领域和社会生活领域的未来积极或消极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及积极—消极性的判断。因此，在 Wengler 和 Svenson (1982) 看来，乐观包括两个方面，分别是个人生活领域的乐观、社会生活领域的乐观。在该评定法中，作答者首先针对 20 项个人生活领域的积极和消极事件（各 10 项，如“你与最好朋友的友谊将持续一生”“你可能会遭遇中年危机”），以及社会生活领域的积极和消极事件（各 10 项，如“在下一个十年，人们将会拥有更多的闲暇时间”“人类会在接下来的 100 年里灭绝”），对每项事件发生的可能性进行 0 ~ 100 的评分，数值越大，表示该事件发生的可能性越大。随后，作答者对每项事件的积极—消极性进行评价，从 -10 到 10，代表从“非常消极的事件”到“非常积极的事件”，“0”表示“既不积极也不消极的事件”。根据事件发生可能性与积极—消极性评价间的相关系数，来表示个体的乐观—悲观倾向。相关系数越接近 -1，表明个体越悲观；相关系数越接近 1，表明个体越乐观 (Wengler & Rosén, 2000)。